

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
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1-25

2011年5月9日

憶睿智寬厚的長者 —— 紀念朱厚澤逝世一週年

孫方明

轉眼間，厚澤（我一直這麼稱呼他，包括作他秘書時）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。2010年5月9日清晨，當我從手機上看到朋友發來的短信——厚澤走了！一時間淚如泉湧，倉促間，由感寫了幾句稱不上詩的短句，題為“哭厚澤”，詞云：“雷電送英靈，天公明心志。平生多憾事，未有一件私，錚錚一鐵漢，傲骨歸故里。正氣常存世，厚澤在人心”。如是發給了厚澤的親人，表悼念之意。其後，義不容辭卻又悄無聲息地配合他的親人，配合陳群林，配合各方的友人，參與處理厚澤的治喪、火化、骨灰回貴陽、墓地安排諸種事務。其間，一種衝動時時湧出胸臆，我要寫點什麼，不僅是為厚澤，更是為舒解自己糾結的心緒。

從“憾事”說起

我與朱厚澤相識 27 年，不算長，也不算短。這中間，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，更多的時間是他眾多的“小朋友”之一。無數次的傾心交談，無論是他作省委書記時，還是任中宣部長時，或不到退休年齡就居家賦閒時，以至最後與病魔抗爭的日子。你看到的，永遠是清醒的朱厚澤、寬厚的朱厚澤、睿智的朱厚澤、微笑著充滿活力的朱厚澤、堅毅的朱厚澤、講話時一語中的的朱厚澤。他的精神感染你，他的學識豐富你，他的思考激奮你。

那麼，朱厚澤的“平生憾事”從何談起呢？我能想到的，至少有三件。但要事先說明，這是我想到的，不是厚澤自己說的。

其一，厚澤從青年時期，就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，進而加入中共地下黨，為中華民族的進步事業，毅然離開大學，成為職業黨務人員。從那時算起，到依照他的級別（正部級）68 歲退休，他有 50 多年時間可以為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工作。可是，在他精力最旺盛的青壯年時期，在他經驗最豐富的時期，有 26 年多的時間，他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，或下放“勞動改造”，或居家賦閒。當然，他仍然生活在人群中，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學習與思考。但對一個有能力工作的人來說，中間又有多少無奈，這不能不是生命歷程的憾事！

其二，厚澤從中學時代就以畢生精力投入其間的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、進步事業，他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，能看到一個獨立統一的中國、富強的中國、民主的中國、自由的中國、法制的中國。而在他離世之前，他卻清醒地看到，這個理想中的中國，有的目標已經實現，有的目標，還得期待“明天，明天後的明天”。這是理想與現實迸發出的遺憾。假如你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理想，不去為

之奮鬥，你就沒有類似的遺憾。後來的人們，會怎樣選擇呢？

其三，厚澤思考過的問題，有厚度、有深度，範圍極其廣泛，涉及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文藝、新聞、美學、社會學等眾多領域。在他生前，卻少有系統的闡發，這裡湧一點，那裡湧一點，涓涓細流，雖已震聾發聵，引人注目；但彰顯他胸中的塊壘，僅是冰山一角。我幾次當著厚澤的面說，你是唯美主義，輕易不願把自己的東西比較系統地拿出來，將來或許會留下憾事。他總是一笑而答：不急不急，再想想。他相信生命力的頑強，總覺得還有時間。他辭世前一個月還握著我的手說：我現在要集中全部精力，同疾病作鬥爭，這一關闖過去了，我一定集中精力，整理一下思考過的問題，到時，你要幫忙。這件事最終沒有做成，我不知道，這是厚澤的遺憾，還是我的遺憾，或許，是更多人的遺憾。

初識朱厚澤

1984年初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決定對貴州進行一次綜合性調研。與省委研究室聯繫後，元旦一過就起程，記得有王小強、陳錫文、高山、白南風、王小魯、謝揚等近十人。

到貴陽後，安排住貴州省軍區招待所，剛放下行裝，省委研究室副主任老許就來告訴我們：省委書記朱厚澤要來看望大家，馬上就到。那幾年農村發展組在全國搞調查，省級領導也見過不少，但調查組剛一落地，省委書記就來看望，還很少見。

一會兒，厚澤就到了，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大衣，戴著鴨舌帽，十分幹練。進門就說：我知道北京有個習慣，進房間就脫衣服，這裡條件差，沒有暖氣，室內比室外還冷，大家可要克服北京的習慣，入鄉隨俗，進房間不要脫衣服。幾句話，一下子就把彼此的距離拉得很近。

招待所的凳子不夠，他很隨意地坐到桌子上，與大家聊起來。他說：大家從磊莊機場過來，一路上很荒涼吧。貴州是全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，也是城鄉落差最大的地區之一。貴陽在全國省會城市中，肯定不是最好的，但也不是最差的。在這裡，你們也許不會那麼深刻地感受到貴州經濟社會的落後。一出貴陽，你們就能感受到貴州最普遍的狀況。當他聽說這次調查的目的之一，是瞭解貴州在全國是最先普遍推行包產到戶的省份，此後的發展卻比較緩慢的原因後，說，從這樣一個角度搞調查研究，很有意思。希望通過調查，給省裡提出一些好的建議。能夠感覺到，對我們的調查課題，他有自己的看法。

交談過程中，朱厚澤講到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中“快變量”與“慢變量”的問題，他分析道，教育、交通、人的素質普遍提高，是“慢變量”，短時間不會有根本的改變，要靠積累；而搞活企業，搞活存量經濟；解放生產力的要素人，開發資源，引進和培養適用人才，只要政策措施對頭，可以是“快變量”。貴州經濟社會發展要想快一點，只能靠改革開放，同時要扎扎實實抓基礎性工作。路子對頭了，一段時間發展可能慢一點，若干年後，就有可能快一點。他最後詼諧地說：“一天等於20年”，是浪漫主義，用於指導經濟工作，非出問題不可；還是一步一個腳印，往前走的好。

臨走前，他與省委研究室負責人商量，說這裡太冷，北京來的同志要有個適應過程，搬到金橋飯店去吧，那裡有暖氣。在貴陽時爭取條件好一點，過幾天到縣裡、鄉裡，讓他們體會一下反差有多大。客隨主便，當天我們便搬到了當時貴州條件較好的金橋飯店。這是我第一次見朱厚澤，時間過去了20多年，當時的場景還歷歷在目。接觸中、對話中，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坦誠，以及骨子裡不服輸的精神。他走後，王小強對我說：這老頭不錯！類似的評價，此後我聽到過無數次。

水龍頭與總閘

1985年初，當時我在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工作（這是1984年夏天新成立的為中央書記處服務的小型調研機構，後改名為中辦調研室），到貴州出差時，見到朱厚澤，有一席談話。那是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不久，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剛剛拉開序幕，市場經濟尚在發育中，由於新舊體制交錯，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，其中一部分被認為是新的不正之風，厚澤談了他的一些看法。回到北京後，我整理了一份小材料，登在中辦內刊上。現摘錄如下：

朱厚澤同志認為：當前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形勢都很好，出現一些問題，例如新的不正之風。對此，第一要引起高度重視，堅決糾正；第二不要大驚小怪，驚慌失措，以致造成一種氣氛，好像改革出了大亂子，應該剎車了；第三要區別情況，分別處理。新的不正之風雖然帶有普遍性，但不同的問題在各地表現形式有很大差異，在程度上也很不相同。

他主張，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，在多大範圍出現就在多大範圍內處理，不要輕易講“宏觀失控”。就像一個水龍頭漏水，修理修理，關掉這個水龍頭就行了，不能因此把總閘關了。改革是歷史性的大變化，出點問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今天這樣好的改革形勢是來之不易的，要珍惜改革的好形勢，堅定改革的信念，堅持改革的步伐，抓住改革的時機。

對新的不正之風，中央明確提出的，要令行禁止，但不要搞層層加碼，把什麼都說成是新的不正之風，好像都是因為搞了改革才出現的。實際上，一些問題是長期存在的，需要持續性的去抓；也有一些問題正說明改革還不徹底，例如黨政機關辦企業，就是政企不分的表現。這類問題，不搞改革也會有，改革真正搞

好了，相反可以杜絕。

糾正新的不正之風，一定要區別情況，分類處理，抓最主要的東西。從貴州全省情況看，主要是經濟搞得不活的問題，而不是搞亂了和失控的問題。今年貴州經濟起勢很好，要用加強管理，加強服務來促進形勢發展得更好，絕不能造成“剎車”的局面，把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好形勢壓下去。

“蟲與龍”

大約是在 1985 年 6 月，厚澤到北京開會，我去看他，說到貴州籍在北京工作的不少年輕人，都希望能有機會與他見見面，交流一下。厚澤一聽，很感興趣，說，好呀，白天不行，要開會，晚上可以。我同他約定時間後，便通知有關人。地點定在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租用的中聯部小招待所會議室，位於西直門內前半壁街甲 22 號。

那天晚上，呼呼拉拉來了 30 多人，把一間不大的會議室擠得滿滿的，有的似乎還是在校大學生。我記得來的人中有朱正霖、瞿小松、羅安義，其他記不住了。約好的時間快到了，我到招待所的門外等厚澤。我正看錶，車就到了，厚澤下車就說：這個地方真難找，兜了一大圈。

厚澤一進會議室，就仔細詢問大家在北京工作、學習、生活的情況，問大家是不是常回家，對貴州近期的情況瞭解不瞭解。厚澤平易近人，很懂年輕人，交談的氣氛非常好，不知不覺就過了兩個小時。

談話的範圍很廣，海闊天空，中間一段時間仿佛是答記者問，年輕人提問題，厚澤作答。議論得最多的，是貴州的人才外流問題。

他講道，貴州是內陸省份，又是山區，交通不便，相對封閉，有更多的人離開大山，到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學習、工作、深造，

短期看，是人才流失，長期看一定會對貴州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。他認為，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的貴州青年，走出去看一看，去學習，去工作；不僅到省外，還要到國外。這些人中間，總會有人回貴州工作、創業的，出去的人越多，回去的也會更多。當他聽到貴州籍在京的一些年輕人，由於環境的變化已取得一定成就後，就幽默地說：看來貴州人不笨，在家是條“蟲”，出去變成“龍”。我主張在貴州不能發揮聰明才智的人，哪裡能展示他的聰明才智，就到哪裡去發展，這是合理的流動。人才無用武之地，比人才流失更不好。

厚澤轉而語重心長地說：就貴州的經濟社會發展而言，貴州需要大批的具有各種特長的人才，但貴州留不住人才，特別是沒有變“蟲”為“龍”的機制和環境，正是省裡各級領導人應該深思的問題。他又說，搞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，大多需要依託實驗室和先進的設備，貴州條件不具備，很難出成果，這樣的人才苗子，哪裡有好實驗室、好設備、好導師，就應該去哪裡。搞應用技術的，搞經營管理的，在貴州是大有用武之地的。講生活條件，貴州跟北京、上海、廣州這樣的中心城市沒法比，跟沿海地區也沒法比。但在貴州，能不能給青年人，特別是有志於貴州發展的年輕人，創造好一點的工作環境，有利於他們創業的環境，有利於他們正常工作的環境。講得更廣一些，不僅是回來的，外來的，要給他們創造好的環境，現在就在貴州工作、學習的人，同樣應該有這樣的環境。有了這樣有利於人才培養和發揮才幹的環境，苦一點，累一點的承受能力就能提高，一條“蟲”，就可能變成一條“龍”。不是一條一條的變，而是大批的變。採取什麼措施能造成這樣的環境，是大家給我出的題目，也是我的收穫。能不能有好一點的答案，我們一起來努力。

十分可惜的是，這次見面之後一個多月，朱厚澤就奉調中宣

部任部長，他沒有來得及在貴州作出改善人才環境的答案。

直面受批評

我與厚澤交往 20 多年，受到他嚴厲的直面批評，只有一次，而當時，我不是他的直接下級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1985 年秋，為加快中央領導層的“新老交替”，在兩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，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。這次會議前有一次中央全會，中間是代表會，後又有一次中央全會，開了近 20 天。我與溫家寶、王忠禹一起作為會議的工作人員，負責會議的簡報工作。一天上午，在人民大會堂開完全體會議後，我跟著代表的人群，準備乘車返回駐地京西賓館。走到人民大會堂北大廳，才知道外面下大雨，一時，所有的人都走不了，聚在大廳裡等雨停。忽然間，見鄧力群與胡喬木一邊說著話，一邊向門口走，我迎了上去，說鄧叔叔，外邊下大雨，走不了。他向我點了點頭，對胡喬木說，這是小孫，淘淘（指他的兒子鄧英淘）的朋友，現在中辦工作。胡喬木也向我點點頭，便側身跟其他人說話去了。鄧力群同我交談起來，他說，你從貴州來的，跟朱厚澤熟嗎？你對他有什麼印象？倉促間，我回答說：我到北京工作前不認識朱厚澤，這兩年有些接觸，對他瞭解不深。印象有一些，感到他有較強的思想理論水平，對改革很堅定，在貴州幹部和知識分子中口碑不錯，很有威信，他平時待人很隨和，但對原則問題似乎很倔，很硬。鄧力群沒有評價，只是對我說朱厚澤到中央工作，是他推薦的。我突然冒出一句，這次黨代會，他會進中央書記處嗎？鄧力群回答，不進。就此，雨停了，大家紛紛上車。

事後不久，我將此事向厚澤說了，他突然變得很嚴厲，直面批評我說：你跟鄧力群同志拉家常，怎麼說無所謂；問進不進書

記處的事，違反組織原則。太隨意，荒唐！現在回想起來，當年確實錯得厲害。

突然來到中宣部

我是1981年初從貴州都勻借調到北京工作的，到1986年初，已有五年，前三年半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搞農村調研，1984年9月又再借調到中央書記處辦公室。由於在黨代會期間，跟溫家寶一起搞會議的簡報，彼此比較熟，他在黨代會後不久就調任中辦副主任，我們在一個食堂吃飯。一天飯後，溫家寶對我說，小孫，我們一起散散步。我知道他有話要對我說，就跟他一起到湖邊散步。他對我說，你借調的時間不短了，夫妻長期分居兩地不是辦法。要就是下決心一個人先調來，要就是下決心回地方工作，你認真考慮一下，宜早作決定。

經他提醒，我很快作了回貴州工作的決定。於是給辦公室領導及分管辦公室工作的兩位書記處書記，王兆國和胡啟立，寫了請求回貴州工作的報告。報告送出不久，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王青林找我談話，他說：我一直想把你正式調過來，中辦人事局也找你談過話，可跟中組部聯繫幾次，都說你愛人的工作不好安排，調動的事就拖下來了。你如果真下決心回地方工作，我可把報告送給兩位書記批示了，我們也會給你作一個好的鑒定。我立即回答，我真下決心了，你給兆國、啟立同志送報告吧。兩天後，王兆國找我談話，他劈頭問我，小孫，給我說實話，你真想走還是假想走？我回答，真想走。他說，那我就批了，再請示啟立。很快，王青林就通知我，兆國給我作了一個很好的批示，他還與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通了電話，那邊也歡迎你回去工作，啟立也批示同意。你準備一下，交交工作，過幾天就回貴州報到。我一

下子踏實下來，開始交文件，收拾行裝。

沒有料到，行程確定之後的某一天，王兆國又找我去談話。他說，小孫，不走了。我很驚訝，便問，不是都批准了嗎？他告訴我：昨天上午開完中央書記處會議後，他和胡啟立、朱厚澤、尉健行一起議了一下，準備讓我到中宣部，給朱厚澤當助手，協助他工作。我連忙說，前幾年我的工作主要是搞農村調研，到中辦一年多，除了參加搞文件，仍是以調研為主，涉及的多是經濟問題，宣傳工作從沒幹過，最好能不去中宣部，還是到地方去工作。王兆國說，這事已經定了，沒幹過的事可以學，不熟悉的逐步熟悉，相信你能勝任。我對朱厚澤很敬重，但確實不想去中宣部工作。可這麼一些大領導決定的事，沒有商量餘地，只能服從了。

就這樣，突然間我就到了壓根就沒有想到會去工作的部門——中共中央宣傳部，給厚澤當起秘書來。那是1986年春節前。

剛到中宣部報到，厚澤就對我說，你先熟悉一下情況，每天各處送來的材料、文件你先看一看，選重要的、急的給我，有什麼看法、意見都可以直接對我說，附個紙條寫下來也行。此外，我這裡的會你都可以參加。

那段時間，所有的體會集中到一個字，就是忙。我和小楊（中宣部辦公廳給厚澤安排的機要秘書）忙，無非是照章辦事，各處送來的東西，看都看不過來而已；而厚澤除了忙於事務，還得花大量精力思考、應對。他常常工作很晚才回家，這就累了司機李國慶，他經常更晚才能回家。我對厚澤說，你這裡工作的頻率，是上廁所都得小跑，他微笑不答。

到中宣部不過十天，王兆國和中辦副主任周傑又找我談話。王兆國問了一下情況後說：厚澤同志將來是要進中央核心層的，這段時間你要經常提醒他，要亮相，要表態，宣傳工作要跟上改革步伐，要有新東西。周傑在一旁說，厚澤像“三明治”，夾在中間，

但兩邊不一樣厚，總得有明確的傾向。

回到中宣部，我把談話內容原原本本告訴了厚澤，他一笑，說：我確實像“三明治”，一邊催著我，一邊防著我，都要我表態，我只能硬著頭皮，不吭聲。他們都很急，我再一急，非出亂子不行。

他還風趣地說：傾向、傾向，傾就是倒，傾得越快，倒得就越快，慢慢地傾，就能像比薩斜塔那樣，傾而不倒。

可惜當時的時局，不允許他“慢慢的傾”，這中間，我無意間又踢了加速“傾向”的一腳，這是後話。

幫陳凱歌“辦事”

厚澤遺體火化前，前來弔唁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，我默默地注視著，覺得有一個人一定會來，結果他沒有來。也許他不知道朱厚澤去世，也許他太忙！

1986年2月下旬，我的好友高山到中宣部找我，問我知不知道陳凱歌，我說，知道，拍電影的，但不認識。高山告訴我，他跟陳凱歌是一個院裡長大的，前一陣陳凱歌相繼拍了《黃土地》、《大閱兵》兩部電影。其中《黃土地》爭議很大，已經拿了國際上的一個獎，最近有可能在美國評另一個獎，可國家電影總局不讓他出去，說《黃土地》有政治問題。他想見一下朱厚澤，能不能安排一下？我說，情況我不太清楚，你約陳凱歌先來和我見一下面，我瞭解一下情況再說。

很快，我就與陳凱歌見面了，聽他述說原由。第二天，又接到陳凱歌父母的電話，他（她）們說，我們不僅僅是為了兒子。我們搞了一輩子電影，我們希望中國電影有一個好的未來。我把這件事詳細向厚澤作了彙報，他立即表態，約陳凱歌來談一次。

1986年2月26日下午，中宣部召開會議，討論電影《紅樓夢》

拍攝的有關問題。在會上，朱厚澤對國家電影局的丁嶠說：對青年電影工作者要多接觸，多交談，增加相互瞭解與理解。陳凱歌要求和我談一談，很好嘛！

當天晚上，他就約見了陳凱歌，在座的除了我外，還有高山和白慧敏（時為中宣部幹部）。

就此，陳凱歌開始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對朱厚澤的傾述。他說：從來沒有人就《黃土地》的評價和領導的意見向他轉達過任何意見。為什麼出現了不同看法，不能面對面的談一談，溝通一下呢？對《黃土地》藝術上的評價，我並不特別在意，但感到政治上的壓力，流言的壓力。關鍵是，我能不能再拍電影了。外國邀請《黃土地》出去參加評獎，電影局告訴我，不能去了，什麼原因，一句話不講。美國人看《黃土地》，少數人認為是宣傳共產主義；多數人說看了這部電影，中國出毛澤東、鄧小平是必然的，是理解中國的教科書。美國一些著名的電影工作者，認為此片是宣傳，但美國人能夠坐在那裡看一個半小時，至少是一種成功的宣傳。

隨後，陳凱歌回顧了自己到雲南上山下鄉，後來當兵，入黨，回北京當工人，上大學的經歷。敘述了拍攝《黃土地》、《大閱兵》的經過和感受。他認為要允許探索，要認可文學藝術、電影藝術表現形式和方法的多樣性。他舉例說，《迷人的樂隊》應該拍，田壯壯拍的一部很好的電影，雖然一個拷貝沒有賣出去，也應該拍。有人說《黃土地》是歌頌落後，向外國人展示我們的陰暗面。落後不是陰暗面，落後是一種狀態，用視覺藝術反映這種狀態，直面這種狀態，變革、改變現狀的要求才能迸發。有人說我拍電影是為了迎合外國人，這是根本的胡說。

陳凱歌說到：建立新的我們民族文化的建築群，要豐富，要有很深的根基，要刻畫中國深層次的鉅大變化，代表未來希望的東西。賈平凹、阿城這代作家，做的是大事業，真正是在考慮認

識和刻畫深層次變化中的具體變化。電影從宏觀控制上看，要允許出問題，有些問題要靠時間來解決。對新一代電影工作者，一個要有信任感，一個要比較寬容。吳天明就是一個非常需要支持的電影事業改革家，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，堅持改革，堅持嘗試。陳凱歌主張對一部作品、一部電影，不要看得那麼重。他說，反封建、反落後是文藝作品的重要任務，但不要以為靠一部作品、一部電影能改變人的認識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探索中真出點問題，也不用看得太重，實實在在的影響沒有那麼大。

他非常希望，中國文藝、中國電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。中國的商品要打出去，電影也應該打出去。一個強大的國家，應該有開明的文化。而開明的文化，需要開明的領導。他講道，一個強大、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怕別人瞭解的。經濟改革、農村改革再搞幾年，《黃土地》這樣的片子就不會這麼拍。《黃土地》在夏威夷上演，引起了華僑的極大熱情，歡欣鼓舞，天天有人請我們吃飯。中國的國際影響正在擴大，這是不能忽視的。夏威夷電影評選中，六部片子，有三部是中國的，得獎的是中國的。這不是一種光榮？他還說，我們是黨培養的一代人，為什麼不能信任？

厚澤聽了陳凱歌的一席談話，對他能否出國參加影片評獎沒有表態。只是說，今天談得很好，希望以後能看到你拍出更多的好影片。出不出去的事，你不要著急，我來做點工作。

這件事，在朱厚澤看來，不那麼簡單，但他記在了心上，並表現了極高的政治智慧。幾天後，厚澤到醫院去看住院的胡喬木，回來後就對我說：陳凱歌說的那件事，我向喬木同志說了，喬木同志認為應當讓陳凱歌出去。此後，朱厚澤分別給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副部長、國家電影局的丁嶠打了電話。結果大家都知道，陳凱歌不久就順利地帶著《黃土地》出國了。據說還真的獲了獎。

一篇沒有使用的講話稿

1986年2月底，厚澤找我去談事，他說，中央要求召開一次宣傳工作會議，要準備一個講話稿。這段時間，你集中精力準備一下講話稿。中宣部這邊不必來了，就在中辦那邊安安靜靜地寫（當時我單身在北京，住中南海內）。我問寫什麼內容，他說，我現在也沒有太具體的想法。這裡有一些材料，你先拿去看看，構思一下，中間我們可以議幾次。

於是，我開始埋頭準備這個講話稿。幾天後，我擬了一個提綱向厚澤彙報。他對我說：我的意見是不開宣傳工作會，也不開宣傳部長會，分別開幾次不同區域的部長座談會，這樣能更深入的討論問題，廣泛聽取意見，順便吹吹風，逐步達成共識，統一思想。彎子不能拐得太急，拐急了要翻車。這個意見他們還沒有接受。所以要按大會的方式準備講話稿，而且講話稿要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。這下，難度大了。你按大報告方式準備，我按座談會方式準備，這樣有備無患。

此後就稿子的事又同厚澤議了幾次。一次他講道，既然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，就要考慮怎麼逐步消除宣傳理論，包括文藝工作中“兩軍對壘”的狀況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會形成不同的利益主體，不能不考慮“多元化”的對精神生活的要求。宣傳、理論、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築的東西，都要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。有一次議到對許多生活中、實踐中的常識都會出現爭議的現象。我就說，頑固的後面是飯碗問題，一大批人吃了一輩子詮釋的飯，教條的飯，“本本”的飯，只會幹這件事，現在說這一套不行了，就砸了他們的飯碗，他們沒得飯吃。厚澤笑著說，對！看來任何主張後面，都有個利益問題。厚澤要求在稿子裡，要對十

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有一段盡可能精彩的描述，要強調宣傳工作最中心的任務，是為經濟建設服務，為改革開放服務。他提出，黨要指導文藝工作，就要同文藝工作者坐到一根板凳上，坐不到一起，不瞭解文藝的規律，是做不好指導和引導工作的。他還主張，黨的宣傳部門，要從審查一本書、一篇文章的具體事務中超脫出來，研究全局性的問題，把握輿論的大方向。

稿子起草過程中，國務院領導關於要給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，經濟理論的探索膽子要更大一些的批示出來了。朱厚澤明確地指示，要把這個批示的精神，拓廣到宣傳理論工作中。

1986年3月2日，厚澤決定到天津市搞調查，徵求意見。隨行的有中宣部秘書長李彥，宣傳局副局長李傳華，他要我也一起去。在天津期間，召開了幾次座談會，還專門向天津市委書記倪志福，天津市長李瑞環徵求對宣傳工作的意見。

回北京後，他馬不停蹄地找人徵求意見，到新聞單位搞調研，我陪同去的就有四次：一次是到馬洪辦公室拜訪馬洪；一次是到童大林家拜訪童大林；一次是到《經濟日報》調研；一次是到《中國青年報》調研。他注重調查研究，始終保持虛懷若谷的謙遜作風，踏實認真的工作態度，集思廣益和實事求是的學風，給我們這些隨行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86年3月10日，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兆國在中南海勤政殿小會議廳召開會議，參加人有朱厚澤、周傑、溫家寶、陳進玉、張宏遵和我。會議討論的中心，仍是宣傳工作會議。看得出王兆國對當時的宣傳工作狀況不滿意。他指出，宣傳工作不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，耀邦同志最近講了宣傳隊伍的素質問題，這也要成為宣傳工作會的中心議題。厚澤這次的講話，要帶點鋒芒畢露的味道，要拿出鮮明的觀點，不能模稜兩可。朱厚澤接過話說：你們

的要求都上青藏高原了，我是想簡單點，開小會，大家來議一議，交流一下思想，會後給書記處寫個報告就妥了。參加會的人，除我外都發了言，最終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。

1986年3月16日下午，在中南海勤政殿胡啟立辦公室，又召開了討論同樣問題的會議。參加人有胡啟立、王兆國、周傑、溫家寶、王青林、陳進玉、張宏遵和我。啟立上來就說：我同意厚澤的意見，我的想法是變成一個宣傳部長的例會。研究部署全年的工作，總的題目是：研究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恢復和發揚宣傳工作的優良傳統，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。我們搞了20年的武裝鬥爭，30年的建設，六年的改革，積累的問題很多，要通過相當長的時期來逐步解決。要通過一系列的會議，一個一個問題的解決。工作抓什麼？一是抓指導思想，造成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，使黨和知識分子增加互相信賴、互相支持、形成共同奮鬥的和諧氣氛。提倡各級領導，同文藝、理論、教育、科技工作者交朋友，當前特別是文藝和新聞界。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，保證改革順利進行，同時為更深入的改革提供社會心理準備。二是抓大氣候，宣傳工作講政治，就是要講改革開放，為改革服務，為進一步改革作準備，為了爭取改革邁出更大的一步，讓新體制起主導作用，宣傳工作做好了，衝突、矛盾就會減少。要坦率地回答現實提出的問題，缺點就是缺點，問題就是問題，講清楚不會喪失群眾。三是抓隊伍建設，包括幹部培訓，要注意新聞的現代化。手段的現代化，無比重要。傳統的方式是遠遠不夠的，要抓大眾傳媒手段。會上，兆國、厚澤講了自己的意見，其他人沒有發言。胡啟立最後說：對中國這場改革，有不同看法，不同意見，不可避免，中宣部迴避不了這個問題，也不必為此緊張。相反，對這麼複雜的大變革，沒有不同看法，反而不正常。有不同意見，對改進工作有好處。關鍵是要有一個寬鬆的環境，中

宣部首先就要做到。當然，黨的紀律要遵守，一切要以中央正式文件為準。宣傳會議怎麼開，開大開小，由中宣部定。厚澤同志總要準備一篇講話，要不要拿到書記處會上通過了？厚澤回答：講了再報告吧。胡啟立表示同意，講了再說吧！於是，散會。

到胡啟立辦公室開會前，由我起草的講話稿已初步成形，正發給有關方面徵求修改意見。我知道朱厚澤的習慣，喜歡有備而為的即席講話，不喜歡按稿子作報告。散會後在回中宣部的路上，我對厚澤說：看來那篇稿子不用了。厚澤說：還得繼續修改，回頭讓賈春峰（時為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）幫著你修改。還是那句話，有備無患，誰知道還有什麼變化。直到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召開前，厚澤才正式告訴我，那篇稿子不用了。後來我和賈春峰覺得稿子的一些內容不用太可惜，於是經過刪節和修改，用筆名發表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內部刊物上了。

“寬鬆、寬厚、寬容”及其它

1986年整個5月和6月上旬，我隨同高尚全、陳一諮、劉澤澎、王小強、馬凱、杜鷹、鄭洪慶、李劍閣、李俊、盧邁、白南風、趙明等人赴匈牙利、南斯拉夫考察東歐改革，不在中宣部。回國不到兩天，厚澤又作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，陪同團長習仲勛到南斯拉夫訪問。厚澤出訪回來，鄧小平已經發出了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。

6月下旬和7月上旬，厚澤開始頻頻講話，按他的說法是：不斷下點毛毛雨，吹點微微風。他先後在《光明日報》全國記者會、《中國青年報》記者會、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、全國音協會議上講話。每次講話他差不多都會詼諧地說，我是“死豬不怕開水燙”，骨子裡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敢精神。因為他深知，這些“毛

毛雨”、“微微風”對他個人而言，會意味著什麼。這些講話，比較系統地闡明了他對宣傳理論，文化藝術指導方針的重大調整，這就是人們熟悉的寬鬆、寬厚、寬容的“三寬政策”。他講道：寬鬆是指思想理論，文藝創作，新聞出版的環境問題；寬厚是管理宣傳工作的基本方法；寬容是對百家爭鳴中的不同意見的基本態度。

不少單位整理了他的講話錄音，希望公開發表，他一直不同意，強調是內部講話、即席發言。後來，一張小報，《新文化報》整理了朱厚澤在音協會議上的講話，希望登出來。我去請示他，他想了一下說，你把稿子調過來，認真改一改，如果還行，就給他們登，下點毛毛雨。

我把記錄稿調過來後，厚澤很認真地看，指出文字上的幾處地方，需要斟酌一下，然後要我對全稿順一順。我問他“順”的原則，他說：人家整理的錄音稿，講過的要認賬，沒有講的，不能加進去。口語和方言，要加加工，個別提法要認真斟酌。我的辦公室緊鄰厚澤的辦公室，在“順”的過程中，他想到什麼，就出來吩咐我，有時還同我議論。例如，講到商品經濟的“銅臭”時，他說，中國商品經濟的“銅臭”太少了，比銅臭更壞的東西太多了，要用商品經濟的大炮猛烈轟擊，一些傳統的東西才會消亡。他又特別指出，這個意思不要寫進去。我“順”完後，他又仔細看，如此幾個來回，最後一次他改了幾個字，對我說，就這樣吧，打印出來，給《新文化報》。

此後，他去了北戴河，我留下來值班。一天上午，紅色電話機響了，我接電話，是從《人民日報》打過來的。電話裡說，看了《新文化報》朱部長的講話，認為很好，請示一下朱部長，《人民日報》能不能轉載。我很清楚，此事問厚澤，他會很為難，很可能不同意轉。便自作主張回答道：朱部長不在北京，我是他的秘書某某，我的意見是，《人民日報》轉不轉這個講話，應當由《人民日報》

決定。對方作了電話記錄，理解為不反對，至少沒有明確不同意轉發。就這樣，朱厚澤關於“三寬”的講話出現在中央機關報的頭版，新華社好像還發了通稿。

《人民日報》登出的當天下午，厚澤從北戴河給我打電話，問我是怎麼回事，我如實將經過給他講了。他考慮了一下對我說，明天你到北戴河來。當我去中辦管理局辦好第二天去北戴河的車票後，又接到厚澤的電話，他要我別去了，說他過兩天就回北京。

朱厚澤回京後對我說：原想下點“毛毛雨”，《人民日報》一登出來，沒有想到搞出這麼大的動靜。我一時無言以對。這麼大的事，他始終沒有批評和責怪過我。若干年之後他才對我說：那次《人民日報》登出講話稿後，受到了批評，涉及宣傳方針的調整，事前也沒有通過中央。中央曾委託習仲勛跟他談話，他能感到，仲勛同志是贊成他的意見的。

記得在此之前，還有一次類似的事。有一次人民出版社打電話請示朱厚澤，說王若水有一個集子，能不能出。我回答：現在提倡“文責自負”，作者的一本書，出版社出不出，決定權在出版社。出還是不出一本書，要由中宣部長決定，好像不妥吧。對方問了我的姓名、職務。沒再說話。據說，這本書後來真出了。事後我向朱厚澤彙報此事，他既不說我處理對了，也不說我處理錯了，一聲不吭，一笑了之。

1986年7月底，忽然間，我調北京的事又出了問題。中宣部辦公廳人事處通知我，說中組部認為我愛人工作不好安排，（我一直堅持要調就全家調，只調我個人，就回地方工作）。我痛快地回答，沒關係，我願意回地方工作。我把情況向厚澤講了，他也無可奈何。我對厚澤說，我把這邊的工作交一下，先回中辦，我的工作關係和組織關係還在那裡，然後從那裡辦手續回貴州。說心裡話，協助厚澤這樣的領導工作，我義不容辭，但我實在不願在

中宣部這樣的機關工作。現在正好，矛盾解決了。

回到中辦，又開始作回貴州工作的準備，王青林把年初王兆國、胡啟立的批件找了出來，又開始給我寫鑒定了。王青林對我說，忙了這麼多年，放你 20 天假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北京沒玩過的地方去玩一玩。於是我通知妻子帶著女兒，到北京來，去沒去過的東北轉轉，然後舉家回貴州。

誰想 8 月底從東北回來，事情又變了。原來在我外出期間，我的老領導並“忘年交”吳象同志（時為萬里秘書兼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副主任）得知此事後，跟萬里說了。萬里對朱厚澤很欣賞，說他是“好中宣部長”，聽說這事後便說：要支持厚澤同志工作，小孫愛人是什麼金枝玉葉，調不進北京來。萬里隨即讓秘書孟曉蘇給中組部副部長曹志打電話，講了萬里的意見。結果等我從東北回來，中組部的調令已經發了（全家一起到北京）。就這樣，我 8 月初離開中宣部，9 月份又回到中宣部。可見，人生常常是由你不能決定的因素決定你的路，我雖無可奈何，卻也無怨無悔。

到中央政改辦

回到中宣部重操舊業不到一個月，記得是 1986 年 10 月 7 日上午。一上班，厚澤就找我談話，說中辦來了通知，讓你今天下午到廠橋中辦招待所參加一個會。我問什麼會？他說：最近中央成立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機構，下面要設一個辦公室，臨時調你過去工作。我問他要去多長時間，他微笑著說，我看時間短不了。我說，是全天候參加那邊的工作？他說：估計是。我說：能不去嗎？他說：政治體制改革是當前最重要的事，那邊既然要你過去，你應該去。我說：你這邊的事怎麼辦？他說：沒有問題，找一個人就行了，你有人選推薦嗎？我說：王成德行不行？他說：可以。

就這樣，我進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，從此離開了中宣部。卻和厚澤保持了終生的關係。

1987年3月，當時厚澤早已離開了中宣部，王大明（時為中宣部常務副部長）約我到中宣部談話，他對我說：我在中宣部，你的關係放在這裡沒關係，但我可能要走，你最好能儘快的把關係轉出去，免得將來我走後有人為難你。於是，我很快寫了請調報告，王大明一手督促，調到了國家體改委直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，任所長助理。

一年多時間，我兩進兩出中宣部，現在想想，很有意思。

難忘的兩件事

1987年元月，隨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，朱厚澤也很快被免去中宣部部長的職務，一時沒有安排新的工作。就在那幾天，老領導杜潤生把我叫到家中。他對我說，你去跟朱厚澤說一下，讓他趕快就中宣部工作期間的事，給中央寫個檢討。那時杜老與厚澤沒有工作關係，彼此也沒有個人交往，但他關心朱厚澤。我對杜老說：就我對厚澤的瞭解，他可能不會寫檢討。杜老說：勸勸厚澤，寫個檢討沒什麼，我一輩子不知寫了多少檢討。寫檢討是爭取工作的權利，厚澤還年輕，還要工作。我把杜老的話告訴了厚澤。他笑笑說：杜老是用心良苦，他的好意我領了，檢討就沒必要寫了，在我免職的會上，我說了，是非功過，讓歷史作結論。當問他工作安排的事，他告訴我，談過話了，說要重新安排，我個人的意見是到中央黨校搞理論研究。不久，他安排到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。真是無巧不成書，從此便與杜老結下終生不解之緣。

胡耀邦辭去總書記後，他安排的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解散了。

不久，成立了由鮑彤為組長的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。厚澤知道後，專門把我叫去，他鄭重地說：你一定要向鮑彤轉達一個建議，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，在十三大報告中，一定要把“初級階段”的文章做足，“初級階段”講清楚了，改革開放，現代化建設就有了理論基礎。回去後我把厚澤的意見告訴了老鮑。鮑彤說：真是不謀而合，厚澤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一致。你轉告厚澤同志，“初級階段”理論，一定會是十三大報告的中心話題。厚澤提這個建議時，還沒有安排工作，在家臨時賦閑。看來，憂國憂民，“關心國家大事”，是他們這一代人的“痼疾”。

幾次記憶猶新的談話

1986年10月，我剛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不久，內部熱議“黨政分開”的涵義，有人有不同意見，認為不宜提“黨政分開”，應該改為“黨政分工”。我回中宣部看朱厚澤，跟他議及此事，他毫不猶豫地說：當然是“黨政分開”的提法好，“黨政分開”，有質的規定性，黨是政治組織，但不是政權機構，不是國家機器，這二者性質完全不同。“黨政分開”有明確的針對性，針對的是“以黨代政”和黨的各級組織政權化，官僚化。“黨政分工”沒有質的規定性，無非分配工作，這件事你幹，那件事我幹，界限永遠不清楚，解決不了“以黨代政”的現狀。我們說我們是執政黨，我們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國家政權組織，那就依法進去執政呀！主體部分不進去，在國家政權組織之外發言施令，以黨代政，管理一切，形成兩套政權組織，名實不符，弊端太大。這可是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重大問題。聽了厚澤一席話，深深感到，這類問題，他一直在思考著。

我在政改辦期間，有一次到厚澤家看他，跟他聊起法治建設

的問題。他說：“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”，這是文化革命後最重要的經驗教訓，這句話的意義，絕不下於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”。可惜重視不夠，沒有展開作出具體的法律規範。我看這句話的含義至少有兩個方面：一是指黨的各級組織必須遵守憲法，執行憲法；二是指任何黨員，不管擔任什麼職務，不僅在黨章上是平等的，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。例如憲法，是我們黨為主制定的，經一屆人大通過，雖然不斷有條款修改，但其基本的東西沒有動。如公民的基本權利，言論自由、結社自由就一直有。作為執政黨，所謂在憲法範圍內活動，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，應是執政黨的首要任務。如果做不到，就應當修改憲法的相關條款，或明確說明，為什麼目前做不到，大體什麼時候可以做到。否則法律的權威性就會受到損害，主持制定法律的黨，臉上也不光彩。他還說到，法律和黨的規章制度，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規範。法律後面是國家強制力，可以入獄，可以殺頭。黨規最大的約束，就是開除出黨，不能抓人，不能關人，更不能殺人。所以一個黨員，不管職務多高，如果犯了法，同其他公民一樣，首先應該由法律處理，不能由黨的紀委處理黨員違法問題；一個黨員，違反了黨章黨規，但沒有違法，就只能按黨章黨規處理，不能用類似違法的方式處理，即不能抓人，關人，殺人。文化革命後痛定思痛，明確了在黨內要廢除專案制度，這是一大進步。

“六四”風波之後，我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同事們受到了近半年的“審查”，最後階段是“黨員重新登記”。這項活動一結束，我就到朱厚澤家看他。那天聊的事，都不記得了，沉澱在記憶中的就幾句話。他說：這一次，要作好長期坐冷板凳的思想準備，我已經跟他們說了，不要再安排工作了。你們年輕，一定要耐得住寂寞。其實當時他不過 58 歲。我回答說：你們都無所謂，我們更無所謂了，忙了近十年，正好休息一下。他看我想得很開，

心態尚可。說道，有這種想法就好。從那時起，我們都離開了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開始講黨的“一代核心”，“二代核心”，“三代核心”。一天去看厚澤，講到這件事。厚澤說，這個提法不科學，不應該講“代”，而應該講“屆”，黨的領導人，都是由一屆一屆中央全會選出來的。一講“代”，十幾屆黨代會，多少次中央全會就看不見了。黨章上就沒有這種說法，它經不起推敲。

2010年初，厚澤的病情惡化，住進了北京醫院，進去時還行動自如，很快，受病魔和放化療的雙重折磨，身體狀況急劇衰弱。4月中旬，我陪他的老部下、老同事李萬祿（原貴州省委常委、貴陽市委書記）和劉也強（原貴州省委常委、組織部長）去北京醫院看他。厚澤身體狀況很差，但異常清醒。由於他免疫力下降，出現了交叉感染，我們進去後都戴上了口罩。那天他很高興，原來說好進去探視一下，講幾句話，十分鐘就出來。厚澤不讓走，坐了近一個鐘頭。談話中回顧了往事，講到貴州的發展，甚至講到貴州的水利建設。臨告別前，厚澤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：我們都是普通人，碰上這樣一個歷史時期，多多少少做了一點事，我們努力了，也就可以了。

這是我們到厚澤的最後一句話。幾天後，再去看他，已經戴上了氧氣面罩，不能交談了。

又過幾天，他便永遠離開了我們！